

20世纪中国小说的 心理与文化探寻

徐秀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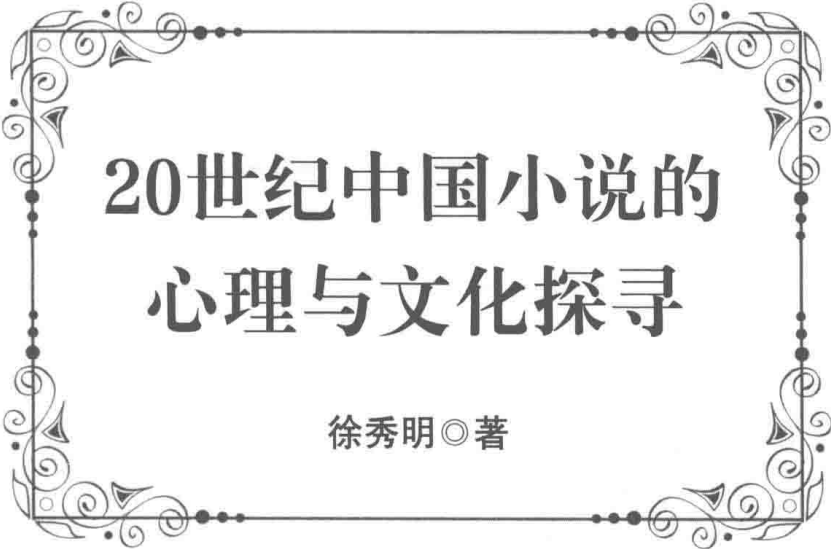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 De
Xinli Yu Wenhua Tanxun

徐秀明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小说的 心理与文化探寻

徐秀明◎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心理与文化探寻 / 徐秀明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308-18274-4

I. ①2… II. ①徐…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20 世
纪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2997 号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心理与文化探寻

徐秀明 著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周 群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4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274-4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①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① [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石永礼、赵文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 页。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缺失”	10
第一节 形式特征：“多”与“少”	12
第二节 创作心理：“轻”与“重”	13
第三节 审美距离：“远”与“近”	16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心理小说与文化流变	21
第一节 源流谱系：定义背景与发展流脉	24
第二节 至深深处：小说主题与心理含量	34
第三节 忧愁忧思：沉重分歧与文化心理	47
第三章 “五四”前后的个性心理图景	59
第一节 心理成长：《铸剑》的叙事策略与隐喻抒写	60
第二节 深层结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心理分析	68
第三节 现代体验：《蚀》《子夜》中的恐惧与诱惑	76
第四章 革命年代的文化张力与叙事主题	88
第一节 主流叙事：革命年代的中心叙事	89

第二节 边缘话语:身体写作与自由精魂	106
第五章 新启蒙年代的文化热潮	115
第一节 社会反思:80年代文化盘点的再思考	116
第二节 学术脉络:当代文化思潮与社会变迁	123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嬗变	135
第一节 民间视野:体制内外的狂狷媚俗	136
第二节 学院立场:知识分子的流变守常	151
第七章 实利为先:金庸小说与新意识形态	164
第一节 问题框架:意识形态与香港文化	165
第二节 文学特征:商业利益与类型衍化	168
第三节 精神实质:政治偏好与小说旨趣	172
第八章 理性沉思:海外华文写作的文化体悟	186
第一节 时代人性:华裔作家的生存抒写	187
第二节 文化空间:内地作家的海外感怀	193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02

导 言

一、断代因由

站在新世纪的潮头回望 20 世纪的中国,心情是相当复杂的。20 世纪之于中国,肇始于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随后各种惊涛骇浪接踵而至,有绝不逊色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风潮,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曾主导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道路的机会——“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当时中国国门大开,社会秩序土崩瓦解,所有人都在竭尽所能力挽狂澜或者趋利避害,光荣与梦想交相辉映,国耻与家丑集中爆发,一切都在毁灭或者新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那时有犀利明哲、强势进取的西方文化汹涌而至,几千年来天朝上国、周礼秦制的文化旧梦岌岌可危,问题与主义辩论不休、科学与玄学各逞其能——“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无数先贤英烈为追寻现代富强之路而九死不悔,却屡屡误把小雷

① 原话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后被广泛征引,文化意味日浓。其实李鸿章是针对西方诸国虎视眈眈,清政府外患严重而发,主要是说清政府不像以往各个朝代只需应对国内矛盾即可,并未涉及文化冲突等内容。原文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见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107 页。

音寺当作西天圣地,热烈拥抱的总是绝无前例而难以把握的未来——“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虽然具备了成为“好故事”的绝大部分要素,却偏偏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美满结局——中国似乎至今仍是一个与历史循环观纠缠不清的国度。鲁迅曾感慨民国恍如晚明^①,学界普遍将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五四”相提并论……一代代热血青年胸怀大志前仆后继,却总在若干年后误以为一切如故痛彻心腑。因此,20世纪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而且“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即便只为打破以往中国社会进三步退两步的发展桎梏,这段历史也值得反复研究。何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20世纪中国战乱频仍,虽然物质方面破坏极大,却无意中拓宽了国人的文化视野与心灵疆域。世上没有白流的血汗,凡所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短期内饕餮西方数千年文化大餐的痛苦快慰、竭力知行合一导致疏离于传统社会的心灵孤独、被自己立志拯救的群氓民众背叛施虐的绝望愤懑等等,就务实而言,对国家富强并无直接帮助;但从务虚来看,却为未来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重塑,留下了巨大的可能性。

当然,纵使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依旧有人矢志不移无怨无悔。人生不过百年,宏图大业转头空。任你盖世英雄,最终聊以自慰的,也不过一丝内心留痕。印度诗人泰戈尔曾浪漫咏唱: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我不曾在天空/留下羽翼的痕迹,/却为曾经的飞翔欢喜)^②。20世纪中国此类理想主义者不多,但在精神层面上已有类似提升:他们已非只为国家民族献身的传统义士,而是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个体。然而没有礼义道统洗脑的崇高狂热,只能清醒独立地面对黑暗现实与未卜将来,个体承受的精神折磨无疑更多更重。不过学术研究多数侧重宏观上的整体概括;真正重视个体在时代变迁之际的命运转折,

①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② [印]泰戈尔:《流萤集》,李家真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将情感体验视作高于一切的灵感源泉,而且与底层百姓息息相关的,似乎只有文学创作。

二、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史传传统”影响,热衷于渲染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悲欢成败,却对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的生存境遇置若罔闻。近代之后,周作人等人高高擎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底层百姓一无所恃而艰难行走于惨淡人生的心态气度,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主流文学视野。其实就人性而言,皇室贵胄与平民百姓的差别有几?唯有完全抛开尊贤隐讳等顾忌,才能如实发掘人们灵魂深处最普遍的真,详细探讨国人罹难离乱过程中的情感波动与心理蜕变……在天灾人祸如疾风暴雨般扑面而来的20世纪中国,即便学贯中西、境界高妙的文化精英,也无一例外茫然失措、痛楚不堪——汪晖特意以鲁迅文中“反抗绝望”“无地彷徨”等语概括其精神特质,钱理群等人则断定“悲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情感基调^①——中国现当代作家们最感兴趣的hero(作品主人公),绝非从不迷乱困惑的理想人物,而是散见于社会各阶层、在混沌人生中勇敢前行的平民英雄。他们探索过程中的悲欢成败与精神含量,至今极具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好似精致雍容的牡丹,20世纪中国文学则是倔强绽放的腊梅。后者的色泽形态或许稍逊一筹,但其逆势怒放的不羁风姿、风刀霜剑中顽强生存的果敢智慧,同样难能可贵。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文学精品不少,研究者热衷于考据历史上的华美篇章如何谱就,颇多艺术赏析之辞。返观20世纪中国文学,虽然不乏独出机杼的优秀作品,但作家们忧世伤生无暇精雕细琢,作品质胜于文的较多,研究者倾向于避开艺术探讨而剖析现实意义或思想内涵,每多哲思辨析之作,以致温儒敏担心现当代文学变成思想史研究的材料。^②古代文学研究者由此轻慢“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少。即便著名文史学家王瑶,当年也难免受此偏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极力推进与自己并肩前行的“现当代文学”,早年以中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② 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

古文学专家研究出道的王瑶,因教学需要转而研究“新文学”。但他长期误以为此项工作无以名垂青史深感遗憾,做梦也没想到时下会被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人”^①。其实世事不可一概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同样不可替代:那是我们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精神土壤,是早已融入我们血液的空气养料;那里有我们祖辈父辈体温犹在的人生苦难,有至今与我们声息相通的灵魂绝叫……简言之,现当代文学最大特点乃是繁复多元,那里不仅有供人案头清赏的艺术品,更有披荆斩棘者的高歌低吟,文字推敲上或许略显粗糙,但其中犀利厚重的个性光谱与思想锋芒绝非传统诗文可比。

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文人士大夫以诗歌为正宗,抒情传统十分明显;底层百姓无缘诗书,启蒙教育主要由评书、戏文而来^②,但此类叙事文体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商业写作,长期发展滞后。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内容陈腐、形式死板,不利于社会启蒙、文化进步,遂大力引荐西方现代文学范式以革故鼎新。在现代文学的四大文体中,小说因体式灵活、容量最大、善以情节动人等特征,逐渐成为作家启蒙大众的主流文体。它是真正雅俗共赏的最大赢家——不仅保留了通俗文体的市场份额,而且取代了诗歌在高雅文学中的主导地位。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在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努力发掘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现代性转变的关系,书中虽然还有若干关于诗歌的讨论,但主要探讨的已是沈从文、白先勇、陈映真、钟阿城等人的小说。王德威意在强调“‘五四’新文学虽然以打倒旧文学为职志,但对抒情传统其实频频回顾,而且屡有创见”^③。但此一洞见的成立,有一重要前提——必须首先承认:20世纪中国小说家接受的,主要是西方小说启蒙主义理性思潮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虽有类似评书、戏文的启蒙色彩,但内容多为鬼神崇拜、

① 钱理群等:《“书生”王瑶》,《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7月2日。

② 金庸显然持此观点,他笔下粗鄙无文却八面玲珑的韦小宝,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鹿鼎记》“第三十六回 犴鸟蛮花天万里 朔云边雪路千盘”中写道:“韦小宝的学问,一是来自听说书,二是来自看戏。”见金庸:《鹿鼎记(四)》,北京:宝文堂书店1990年,第288页。

③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4页。

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仅简单粗陋,有时甚至近于愚民;而西方现代小说的繁荣,与理性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正如伊恩·P. 瓦特所言:“小说兴起于现代,这个现代的总体理性方向凭其对一般概念的抵制——或者至少是意图实现的抵制——与其古典的、中世纪的传统极其明确地区分开来。”^①这与“五四”时期“重估一切价值”“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主张极为相似。伊恩·P. 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某种程度上把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文献、文化文本进行社会学考察。在他看来,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人的小说,具有新闻性、宣传性、(自我)表达性等多项特性。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之后,小说在四大文体中的优势日益明显,论抒情言志,它笔法语言灵活多样毫不逊色于诗歌、散文;论开启民智,它成本低廉含量惊人却绝无戏剧那种囿于剧院、街头的时空局限……因此,既擅长自娱娱人公诸同好,又便于启蒙心智救亡图存。春秋时期孔子谈“诗”(指《诗经》)之用,有“兴观群怨”之说。到了现代,类似评价其实更适用于小说。1949年以后,小说评论屡屡被政坛人物用作解读思想动向的社会文献、切入时政的利刃投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大众普遍将小说的创作与评论视为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风向标。由此看来,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世态人心的转折变化,小说研究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角度之一。

三、角度方法

不过同为现代小说,中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相去甚远:西方小说涉及社会革命层面的作品,多数是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开笔时从个体主人公周遭琐事中的困扰迷惑写起,笔触围绕着个体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展开,待到其个性发展成熟、思想境界拓宽之后,才自然而然地升华到为国家、民族谋福利的层面。20世纪中国小说则自觉以天下为己任,往往从大到小、自上而下,无论“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还是30年代以降的左翼革命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小说开篇之际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基于启蒙救亡的迫切任务,而按图索骥、按部就班地要求个体需要具备何种素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留

^① [英]伊恩·P. 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页。

给个体自我发展、思想转折的时间和余地太少。这种“遵命文学”的写法,创作初衷或许崇高,但视野过分集中于某一宏大主题,文气格局难免局促狭窄,往往会限制作家艺术才华的发挥。巴金、老舍、丁玲等著名小说家都曾尝试过此类作品,但效果并不见佳。不过很多“遵命文学”本就是作家应时应景之作,艺术粗糙也是情理中事。反倒是一些自由主义、个性张扬的边缘化作品,无意中契合了小说叙事规律,魅力不减当年。

有立意图解政治理想之作,有起意抒情言志之作,有无意其他而纯粹创作欲望推动之作……20世纪中国小说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多元混合体,是以研究者不应以单一标准去衡量所有作品,既不应因政治标准过度揄扬某些小说为传世之作,亦不可以艺术标准为由抹煞某一流派作家的所有心血。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真正的文学史眼光,应该是首先坚持基本的艺术标准,然后根据其各自的类别、意图,给予各自客观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以来,国内学界竞相引荐西方各派方法理论,但真正扎根的并不多,多数理论只是走马灯似的登台亮相,“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国内学者由最初的惊艳叹服、亦步亦趋而逐渐有所批判,这几年更是将西方理论盛行国内视为欧美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之一。其实“天帐云锦用在我,文章剪裁非刀尺”,如果只把理论视为解读文本的工具手段,那么适用就好,不必一味排斥“舶来品”;即使将其视为散播异质文化的载体种子,也不必杞人忧天——中华文化本就是包容性、同化力极强的多元复合体,几千年来,数次游牧民族、异质文化的入侵最后无一例外化为中华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外来推动力。因此形形色色的理论方法,无论传统的文本细读、文化社会学,现代的心理分析、接受美学,还是后现代的症候阅读、结构解构……在文学研究范畴内,说到底都只不过是深层剖析的思路途径,操之由我、运用有效就好,无需计较许多。

20世纪中国小说诞生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之年、寻求个人或家国出路的人文雅士之手,精神光谱格外宽阔繁复。研究者们有的多从“心理”入手,进行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作家创作心理研究;有的习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好作宏观的鸟瞰式的小说史文章。前者胜在对某些文本有深切的会心,但解决不了同时期小说史的根源性问题;后者虽然视野开阔结论漂亮,却往

往以偏概全,总有一些特殊的小说文本不太适用。本书名为“心理与文化探寻”,意在综合二者,以宏观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来解读这一色彩斑斓的小说世界。坦率地说,之所以采用“心理分析+文化主题”的研究路向,既是因为20世纪中国小说自身特点——这些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并非作家们高妙的叙事手腕,而是那段文化混沌期的芜杂世事及其精神影像;亦是作者个人兴趣使然——探查揣摩前辈先人踟躅于时代节点与人生歧路时的心灵痛苦、抉择蜕变,带给作者的除了获取真知的精神愉悦,更多更有价值的是在蹭蹬世事中坦荡前行的智慧勇气。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生命之流奔腾雀跃于书海文丛的鲜活景致,而非青灯泥塑下皓首穷经的无奈疲惫。

四、整体架构

本书的写作是个集腋成裘、逐步拓展的过程:最初不过是些关于20世纪中国小说名家名作的心理分析;继而逐渐由点及面,衍化为对心理小说、成长小说等重要小说类型及其文化语境的反思考证;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一味固守文学批评的传统范畴过于局限,难以将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精神焦虑与问题意识阐释透彻,于是开始借鉴英美学界“文化研究”学派的治学思路,从文化工业与文化政治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与海外华文写作。

最终汇总整理之后,全书共九章,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承接性,大体由“小说心理与文化流脉——文化探究与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与华文写作”三部分组成;逻辑上则是综述与分论的关系。作者小说研究的理论基石,肇始于对中西小说两大叙事传统的宏观综览与整体性比较,展开于对20世纪中国小说“心理”与“文化”互动情形的深入分析。具体呈现为史学考察与地缘诗学两方面的内容。详细情形如下:

第一部分:一至二章,理论综括,逻辑起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以拒绝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横向移植西方小说传统为起点。但以往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它承载宣扬陈腐的封建思想,相对忽视叙事形式方面的内容。其实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哲学、社会学等等,主要就是表达方式之特别。因此,打通小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探究其思想内容与叙事形式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便显得格外重要。本书前两章的宏观

即属此类：第一章，名为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中“心理缺失”现象，实则是以中国古代小说为参照进行中西小说比较，试着分析20世纪中国小说究竟为何不满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改弦易辙而立志效仿“西方/现代”，又“新”在何处等等；第二章，以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心理小说为个案，概括其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流脉与发展趋向。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开始效仿西方小说“向内转”，逐步拓展、深入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看似纯属思想内容方面的增加，但却直接带来了小说叙事形态方面的巨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步受外界文化因素的影响极大。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心理小说的高开低走，不是简单的文学规律问题，必须结合社会历史语境的考察才能分析透彻。

第二部分：三至六章，纵向剖析，史学研究。精要解析20世纪各个时段中国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最个性化的叙事图景，及其叙事形态变化背后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三章，认为“‘五四’前后”中国小说中最具价值的思想内涵或心理图景，是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之后的心理震撼，以及先知先觉后茫然无措的精神困惑与心理成长痛楚；第四章，讨论“革命年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小说中叙事重点的转移分布、迁移流变等等；第五章，反思“新启蒙年代”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留下的文化烙印——从文化史的高度，客观省察前几年被人们普遍美化的“80年代”文艺实绩与地位；第六章，概括“改革年代”之后，中国大地务实之风劲吹，学院学者代表精英文化参与社会文化建构时，志趣指向截然相反的两种精神姿态。

第三部分：七至八章，横向比较，地缘诗学。以典型个案的文本细读为切入点，讨论中国内地、香港与海外华语界等地不同的小说叙事倾向，以及作家学者的文化反思。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化版图长期呈现为祖国内地、台港澳与海外侨界等若干板块相互排斥又藕断丝连的奇怪状态。全面考察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演变，不应把目光局限于内地。其实中国台港乃至海外侨界的优秀汉语小说不少，而且因其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最前沿，无论形式技法的先锋性还是思想意识的现代感，都绝对不可小觑。比如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内地翻天覆地“闹革命”，文学创作整体萧条之际，恰是以白先勇、王文兴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派小说最为兴盛蓬勃之时（余光中等人甚至因此断言当时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台湾）；而香港的文化自由港的地位，使其小说创作中的商业气息与南来作家的传统家国观

念交错混杂,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后来内地小说效仿的首批典范。由于台湾小说研究者较多,本书第二章亦有关于台湾现代派小说的史论概述,故不再赘述,而是将香港小说作为研究重点:第七章,既是关于香港作家金庸的专论,又是对香港小说中大众化的商业化写作倾向的分析思考;第八章,则着眼于海外华裔作家、中国内地学者面对国外异质文化时的不同体悟。

第一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缺失”

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现代小说”或“新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中国文人的共识是：斩断中国古代旧小说的陈腐传承，走现代叙事之路。从清末的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等莫不如此。然而，横向移植西方传统谈何容易？如果对小说的艺术本体缺乏认知，对其自身发展规律理解不足，对中西两大叙事传统缺乏深入细致的辨别认知，如何区分小说真正的新旧优劣，又何以确定未来中国小说发展路向？

20 世纪中国舆论界对小说艺术的看法，长期停留在“形式”与“内容”截然两分的层面上。这种看法的特点是“把审美对象人为地肢解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方面把内容视为作品表达了什么，另一方面把形式等同于单纯的表达技巧，即作品是怎么表达的”^①。在政坛人物有意无意的引导利用下，很多人把内容视为可脱离形式独立存在并处于支配地位的东西，形式则被看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此种可概括为“内容是重点，形式如器皿”的文艺论调在中国甚嚣尘上，使得 20 世纪中国小说乃至整个中国文艺在演变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其实此种传统二元论，不过是一个约定的抽象，学理上根本不足为训。文艺作品中的哲学思想、心理情感、政治观点等等，并非自然有之，亦不可自由剥落，而是存在于作品的具体形式之中。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甚至直接把内容归为形式的一个组成元素，认为艺术品的推陈出

^① 方珊：《形式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第 81 页。

新不是因为内容的变化,而是由于形式的改变。日尔蒙斯基说:“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同理,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①此种说法多少有些极端。但形式与内容的确不可分离——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空洞的形式是不可思议的。概言之,审美对象是形式、内容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体。研究小说流变,不可只从形式或内容单方面入手,而应真正做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深入探讨二者之间微妙而关键的内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化与心理的角度审视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嬗变演化,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可以折射民族文化心理中某些意味深长的部分。

本书的考察从中国古代小说(以下简称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标志性差异——“心理缺失”开始。所谓“心理缺失”,指的是缺乏内在关注、心理描写等。自“五四”以来,学界人人知道古代小说缺乏心理描写,不及西方小说表现深刻,却极少有人追问因由,而且仍然情有所钟。这就是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问题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以西方小说传统为参照,进行“中西比较”^②之后取长补短或见贤思齐。这两大小说传统的综合比较,细究起来自然是个极难的浩大工程。不过大处着眼还需小处着手,纲举目张、要而论之的话,不妨从形式特征、创作心理和审美距离三方面入手。

① [俄]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212 页。

② 严格说来,“中西比较”的概念在学理上并不严谨:首先,中国虽大、文化再强,也只是一个东方国家,如何能与整个西方世界相提并论?其次,“西方”是个相当模糊的文化概念,它在国人的一般性理解中,囊括了英美德法等西方列强;但实际上这些欧美强国的文化传统并不相同,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不应简单视为一个文化整体。不过当时国门初开,能够抛弃天朝上国的偏见迷梦,开眼看世界已属难能可贵,不宜求之过苛。“中西比较”作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热门题目之一,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准,而且其结论往往极具启发意义,甚至蕴含了此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路向,故而不应简单否定。文学方面自然也不例外。